

《〈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之探究》

畢業論文概要

／李偉穎

本篇論文之主題雖然是一部元代的佛教經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以下簡稱《至元錄》），但探討的內容大致上屬於中國佛教史學史的範疇。文中一方面深入探究此目錄的種種情形，包括版本問題，同時略微討論元代佛教狀況，且兼涉唐、宋以及明朝佛教之相關現象。

《至元錄》內有兩項非常特殊的資料而為中國歷代各經錄所無：一是「梵語經題」，另一是「蕃本勘同」。然而這兩項內容卻受到現代佛教學者的詬病。本篇論文的重點在處理蕃本勘同。亦即，現代佛教學者幾乎皆認為《至元錄》是漢文與藏文大藏經對勘的經錄，然而筆者藉由檢視此錄之經目記載、相關的元代史料、文集與碑銘，比對當時的外文經錄或藏經資料，乃至現代學者對於《至元錄》的認知等等，以論證學術界的這種見解不能成立。

全篇分成十章。第一章為緒論。文中大致介紹《至元錄》現存的各種版本以及本篇之研究方法。藉由簡短的版本分析，得知各版本《至元錄》的內容可能不大相同，至少於《磧砂藏》美國本的《至元錄》內只有九卷，而不是十卷。因此，若以為《至元錄》在中國佛教典籍中屬於晚期的作品，而且很少人使用，應該不會有版本上的問題，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

在這一章中，筆者界定所要探究之範圍：《至元錄》與中國歷代之佛教經錄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增加了「經名的梵語音譯」以及「蕃本對勘」，而本篇重點在處理後者，對於前者僅略微說明一些現象。事實上，《至元錄》之梵語經題亦是值得探討的主題。

再者，雖然本篇是探討《至元錄》之蕃本對勘，但由於幾乎沒有什麼學者研究此目錄，以致對於此目錄的整個狀況不是很清楚。所以接著幾章必須先討論《至元錄》的背景及其架構等情形。

第二章探討《至元錄》的由來。《至元錄》是元世祖統一天下之後敕令編集的一部經錄，所以現代學者很容易把它與政治聯想在一起，而將它視作元世祖欲攏絡當時的佛教徒之一種手段。事實上，任何事情的產生絕不可能由單一因素造成，而需要各種條件配合。因此，若僅以政治理由來涵蓋其餘的因素，這是不符合佛法緣起的道理以及科學的理則。況且忽必烈真正的意圖如何，唯有他自己心裡明白，別人只能從歷史現象來推測。

於第二章中，筆者除了從《至元錄》的序文，來探究此經錄出現的因素，也試著從政治、文化、社會等角度，來瞭解此目錄形成的歷史背景。在資料方面，筆者主要是根據佛教的祖師、大德撰述之史傳，同時藉由元代文人的作品，試圖明瞭當時的事蹟，另一方面也參考現代學者對於元初朝政之評述。

在此種探討中，筆者認為政治攏絡或許不是《至元錄》出現的主要因素，而可能起因於釋道二教的衝突。此種衝突早在蒙古憲宗皇帝時代就已發生，且延續到《至元錄》編成之後尚未止息。由於道教徒強佔佛寺，毀壞佛像，並藉《老子

化胡經》及其圖版以誣蔑佛教，因此佛教長老不得不請求皇帝出面主持公道。忽必烈在下令整頓道教典籍之際，或許也順便進行佛教典籍的整理。雖然現代有幾位中、外學者研究過蒙古王朝的釋道二教衝突，然而就筆者所知，似乎不曾有人把此事件與《至元錄》聯結在一起討論。

第三章是考證《至元錄》參與者之背景。《至元錄》之編集者計有二十九位，但只有兩、三位見於正史，另外有一小部分人員的資料尚能夠從元代的文集中找到有關的碑銘記載，其餘至少一半以上的人物沒有什麼線索可尋。筆者原先由元人文集中找到一些相關的資料，後來得知德國學者福赫伯（Herbert Franke）於1996年寫了一篇關於《至元錄》編者的研究。他所引用的漢文資料與筆者所找到的一手資料非常類似。不過，他採取的研究方法是逐一翻譯此經錄所載的頭銜、參與職務等，對於能夠查到生平背景的人物，則以稍長的篇幅討論其事蹟。此種各別介紹的方式雖然很好，但是不容易發現編集者之間的關聯。

在此章中，筆者將這二十九位編集者按照他們的身分、所居地區、參與之職務性質等方式予以分類及探究，發覺即使在欠缺大部分成員的個人資料之情況下，仍然能夠查到某些成員之間的關係。再者，藉由石刻史料以及《大元一統志》等史籍，也找到其餘幾位人物之背景資料。這些是福赫伯的作品中比較少引用的文獻。在解讀這些人物的頭銜方面，筆者認為福赫伯誤讀了一些語詞，而且部分術語的詮釋不太合理，此於論文內略微提及。

在此章中也討論蕃本對勘的方式。學者們大多認為《至元錄》的編者看見西藏經錄裏或著述裏有那部書的相似名目，便認為西藏也有譯本。然而筆者根據資料論證這些編集人員可能是用討論的方式，而不是採取傳統的校讎方式。此由第八章之「蕃本對勘的用語」這個主題之探討，亦可獲得進一步的證實。

另外，文中也討論了兩位代序者與《至元錄》的關係。筆者認為他們分別與當時在江南從事刊刻藏經的僧官楊璉真加、管主八有關。此與福赫伯的看法不同。在論證的過程中，筆者也談到現代學者認定《法寶標目》為宋朝王古撰、元代管主八續集的此種見解可能有誤，它應該是宋代王古的原著，只是元朝管主八把那部典籍刊刻入藏時，請釋克己寫了一篇序文。至於楊璉真加、管主八兩人的事蹟亦於文中略微探討。尤其是對於楊璉真加的評價，筆者與現代學者之見解有些歧異。

第四章討論《至元錄》之編集體例。雖然現代學者如蔡運辰、姚名達、陳士強等人的作品中曾經談過《至元錄》的編排架構，但卻沒有什麼人探討這部經錄之條目所含的成分以及貫穿此目錄的編集原則。因此筆者除了比對《至元錄》與《開元錄》之編排架構，另外試圖剖析《至元錄》的經目資料，且設法擬構《至元錄》的編集原則，包括「梵語音譯的安立」與「蕃本的對勘原則」，並舉例說明其情形。這些編集體例可說是構成《至元錄》的必要條件。

再者，筆者經由版本比對，確定《至元錄》有前、後期版本之區別，而收錄於《昭和錄》內的《至元錄》是屬於後期的本子。此種差異影響到經錄體例亦產生變化，以致造成使用者對於蕃本勘同詮釋上的歧異。這部分似乎也沒有學者提

及。筆者試著將《至元錄》前、後期本子之體例改變歸納出一些原則。至於《至元錄》的內容為何有大幅度的修改，目前仍未找到答案。

第五章略探《至元錄》收錄之部數。文中首先根據編集者慶吉祥撰的分類資料，討論其中之部數差異。接著藉由分析、比對《至元錄》所引用的幾部經錄，以便瞭解《至元錄》是否將《開元錄》、《貞元錄》、《祥符錄》、《景祐錄》等經錄所載的經目全部收錄。

經由此種探討，筆者察覺到這些經錄本身其實皆有不少的問題。不僅在部數記載方面，甚至於資料的可信度方面亦值得商榷。尤其是唐朝釋圓照撰的《貞元錄》與《貞元新錄》的問題特別多。國內學者曾經以政治的角度來討論圓照撰的經錄。筆者覺得僅以單一的政治理由來看待圓照的這兩部經錄是不太恰當的，因為當時尚無刊本，典籍流傳不易，而寫本的流通就牽涉到傳抄的問題。現存幾部圓照撰的經錄，內容就有不少歧異，因此需要詳細考查。小野玄妙在《佛教經典總論》中提到圓照的《貞元錄》與《貞元新錄》可能是被南唐釋恆安竄改。他認為日本所傳之古寫本可說是圓照原作之傳本，沒有改竄的怪異記事，且保留了三階教的相關經目，而這部分在現行本中已然刪除。不過，小野玄妙並未說明古寫本是指什麼本子。筆者檢視小野氏所引述的資料，發覺他所謂「不愧為圓照著作之原本所傳」¹的古寫本似乎也有一些問題。事實上，日本七寺古逸經典以及大谷大學收藏法隆寺本之古寫本藏經，其《貞元錄·入藏錄》之經目就有一些出入。

再者，小野玄妙在《佛教經典總論》書中載有《祥符錄》卷二十一與《景祐錄》卷二十之「入藏錄」，並於其資料末尾表明是出自原錄。由於小野氏於其書開頭提到《祥符》、《景祐》二目錄是山西趙城縣廣勝寺大藏中所發現的，於是筆者查閱《宋藏遺珍》以及大陸版《中華藏》內的此二目錄，發覺皆缺入藏錄。筆者又比對《天聖釋教總錄》下冊所收之《祥符錄·入藏錄》，亦與小野氏的資料有些出入。因此其資料的來源頗令人費解。

由探討中得知現存之各經錄皆有編集上的缺失以及版本差異等問題，然而現代學者對於《至元錄》創新的「梵語音譯」與「蕃本勘同」這兩部分似乎特別苛責。筆者認為或許應該將各經錄的狀況全盤瞭解之後，才能夠以比較客觀的態度來評論《至元錄》。這部分仍有待繼續努力。

第六章是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探討《至元錄》與漢文大藏經的關係。首先是討論《至元錄》的版本，其次論證《至元錄》是否為某一部藏經的目錄。就前者而言，由於現存的兩部《磧砂藏》皆不是完整的本子，所以先要釐清這兩種《磧砂藏》的情形。以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發行的《磧砂藏》而言，其底本是在西安開元寺發現，並經過重新編校、配補而成的本子。在這些配補本之中有不少珍貴的資料，包括元代刊刻的《延祐藏》。因此文中稍微探討了《延祐藏》的情形。至於美國普林斯敦大學收藏之《磧砂藏》，原來收藏於北平大悲寺。這套藏經有一半以上是配補的，其中大部分是鈔補本。不過裡面也蘊含許多罕見的本子，例如一部久已亡逸的唐朝義忠著《大乘百法明門論疏》，另外尚有明朝惠帝建文元年刻的《天龍山藏經》。如此珍貴的文獻竟然無人探索、研究，以致讓它埋沒在

故紙堆中，這是十分可惜的事。或許可以成爲今後研究的方向之一。

第六章第一部分的重點放在《磧砂藏》美國本的探討。因爲關於《磧砂藏》美國本的情形，除了胡適的《記美國普林斯敦大學的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磧砂藏經」原本》以及屈萬里的《普林斯敦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略微提及這套藏經配補的版本，此外似乎沒有別的學者討論這套藏經的版本問題。由於這兩位學者的文中皆未說明什麼典籍是屬於何種版本，所以筆者試圖分析藏經之版面形式，從而推斷這套藏經所收的《至元錄》可能是白紙鈔補本。

至於第二部分，是因爲佛教學者通常認爲《至元錄》即是元代刊行的《弘法藏》之目錄，但迄今未找到直接的證據足以證明。針對此種現象，筆者首先探討元朝刊刻的藏經及刊刻的時間，並且論證《至元錄》不可能是《弘法藏》的目錄。接著根據元朝趙璧撰的《大藏新增至元法寶記》，而推測《至元錄》大概只是一部經錄，就如同隋朝的《眾經目錄》，並未實際形成大藏經。

第七章略論《至元錄》所依據之蕃文藏經或經錄。就筆者所知的文獻來看，元代有藏文藏經，而西夏文藏經則早在宋代就有。因此《至元錄》所謂的「蕃本」究竟是指什麼，必須要釐清。筆者首先從史學的立場探討中國中古時期對於「蕃」一詞的定義，並且從語言學的角度論述中古時期相關周邊民族的用語，期望能瞭解此經錄所指的蕃本是何種語文的本子。

其次根據現存之資料，探討迄至元代的藏文及西夏文之經錄與大藏經的狀況，以便瞭解何者比較可能是《至元錄》所採用的本子。以藏文藏經而言，就筆者所知，完整的藏文藏經出現的時期應該是在《至元錄》編成之後。雖然近年來在四川省石渠縣以及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發現時代不確定的藏文石刻藏經，但藉由探討果洛石經的種種狀況，推測它不太可能是此錄所說的蕃本。換句話說，現代學者主張《至元錄》是與西藏大藏經勘同之見解，可能根本無法成立。至於藏文經錄則是比藏文藏經出現得早，因此文中探討早期的藏文經錄出現的時代。得知目前現存較早的經錄爲《登噶目錄》，而比《至元錄》晚三十多年編成的藏文目錄則是《布頓目錄》。

另外就西夏文藏經而言，其重點放在探討宋、元時期之西夏文藏經的翻譯、刊刻及流通的情形。得知西夏文佛典之翻譯非常迅速，刻經事業相當發達，甚至改良宋朝傳來的印刷技術。所刻的西夏文藏經在當時已有「番大藏經」之稱呼。雖然西夏後來遭到亡國的命運，但戰亂平息之後，党項人設法重新刊刻西夏文藏經。即使在元代，西夏文藏經依然流通於河西地區。所以筆者認爲《至元錄》所指的蕃本，以西夏文之可能性或許要大於藏文。雖然西夏文藏經刊刻的年代早於《至元錄》，但目前只剩下少數佛典殘存，且未找到其藏經目錄，因此目前尚無法明確評斷《至元錄》與它們的關係。

第八章主要是從漢文藏經的角度來談《至元錄》中之「蕃本」。這一章分成兩部分。第一個部分是比對《南條目錄》中所載之《至元錄》蕃本勘同的資料，因爲南條文雄譯補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在佛學研究中經常被引用。其經號甚至被納入《大正新脩大藏經勘同目錄》中之「現行各大藏經函號」項目內，以供

讀者查閱。由於《南條目錄》可說是近代學者對於《至元錄》蕃本勘同資料認知的具體呈現，所以必須瞭解《南條目錄》內記錄的勘同資料與《至元錄》之記載是否有差異。

筆者用新文豐版《磧砂藏》之《至元錄》與《南條目錄》所載之蕃本資料比對，發覺《南條目錄》所譯的蕃本對勘問題也不少，主要原因是南條文雄根據《至元錄》晚期版本的記載。由於晚期蕃本資料欠缺指稱詞，而把同本異譯的指稱詞當成蕃本對勘之指稱詞，在認知上已有些偏差。其次是因為《南條目錄》以《明北藏》為底本。其經目順序與《至元錄》不同，有一些同本異譯的經目被拆散而未排在一起，不易顯示出蕃本對勘在《至元錄》晚期本子中受到同本異譯指稱詞的影響有多大。再者，南條文雄並未將經目資料的編集方式統一，特別是有關蕃本對勘放置的位置，以致造成使用者在查找其書所載蕃本勘同資料時產生困擾。

第二部分是探討《至元錄》所呈現之蕃本對勘狀況。包括瞭解前、後期版本在蕃本同闕上的差異何在，分析蕃本對勘的用語等，並且說明版本問題對於《至元錄》所造成影響。另外也談到如何使用本篇論文的附錄一，以瞭解《至元錄》前、後期版本之蕃本對勘差異。藉由此種用語的探究，而確認《至元錄》之蕃本勘同是採取討論的方式進行。

第九章是從藏文及西夏文經錄的立場以論述《至元錄》中之「蕃本」。論證的基礎是根據筆者所整理的附錄一、附錄四、附錄五和附錄七。首先把《登噶目錄》、《布頓目錄》中的顯教經律部分、殘存西夏文佛典錄之經目，分別與《至元錄》中之蕃本勘同記錄進行比對。其次以《至元錄》中載有「與蕃本同」的律典為例，來瞭解蕃本勘同記載是否與《登噶目錄》、《布頓目錄》及殘存西夏文佛典錄一致，或是比較接近何者。經由此種比對，得知殘存之西夏文佛典對應於《至元錄》的蕃本勘同記載，其比率高於藏文對應的情形，而且西夏的聲聞律也不只根本說一切有部律一種。因此大致可以確定：縱使《至元錄》所說的「蕃本」不是指西夏文經錄，至少它不可能指藏文經錄。

第十章則為結論。大致分成三部分。首先簡略回顧第一章至第九章各別研究之主題，其次評論《至元錄》蕃本勘同之現象與問題，並談到《至元錄》仍可繼續探索之方向。最後則是評述大陸學者蘇晉仁所撰有關《至元錄》的文章。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貫穿全篇的重點，那就是版本問題。在第一章內已暗示《至元錄》有版本上的歧異。事實上，這不是《至元錄》獨有的現象，筆者於第二章的注解中討論《佛祖統紀》以及《佛祖歷代通載》之版本問題，而在第三章的注解內論述清朝大量修改遼、金、元相關文獻中的譯音。於第四章，特地以一小項目探究版本造成《至元錄》體例之改變。於第五章檢視《至元錄》所依據諸漢文經錄時，發覺這些目錄同樣也有版本問題，而且這種情形不只古代才有，即使是現代發行有關山西趙城廣勝寺發現的《金藏》，於同一部典籍的內容、形式就有些不同。第六章討論現存的兩種《磧砂藏》皆是配補本，而《磧砂藏》美國本比目前流通之新文豐公司出版的《磧砂藏》更複雜。第七章則提及藏文藏經的版本歧異比漢文藏經更嚴重。第八章於比對《南條目錄》時，談到現代學者並未

察覺《至元錄》有版本上的差異，以致造成認知上的偏差。第九章於討論《布頓目錄》時，指出郭和卿的漢譯本所依據之藏文底本與筆者所見到由德格木刻版整理而成的藏文本，二者內容亦有些不同。

1 參見小野玄妙著、楊白衣譯《佛教經典總論》（臺北，新文豐出版，民 72 年，初版）第 562 頁上。

